

染布匠：妙手染出七彩布匹

□晚报记者 朱保彰

染布匠，顾名思义就是专业从事布匹浆染的人。自从人类开始纺织穿衣以来，染布这个行当就应运而生，它是几千年来劳动人民世代沿用的一种传统手工艺术，历史也相当悠久了。染布机的雏形可追溯到商周时期，人们出于对色彩的喜爱，所以也就有了染布匠。在物质并不丰富的年代里，为了节省，人们对衣服布料都是物尽其用。在改革开放以前，染坊的生意如日中天，但随着纺织印染工业的快速发展，染布这一老行当逐渐萧条，以至于现在很难见到染布匠的身影。

染布艺术历史悠久

“收布取布啰，收布取布啰……”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在记者的记忆中，经常会有人拉着架子车，用一个铁皮卷的喇叭筒子边走边卖力地吆喝，这就是记者对染布匠的最初印象。染布匠们隔三差五地在村头出现，人们将半个竹签交予染布匠对号后，才能找到所染的布匹或衣物。

采访染布匠让记者着实费了一番周折，多次寻找过去从事染布的人，大多是年老的都已经过世了，年轻的改行从事其他行当了。前不久，记者在沈丘贡土布的传承人那里得知，在沈丘县石槽集乡至今

还有一位坚守传统工艺的染布匠，他叫张京华，虽年近古稀，仍然开着小染坊，维持日常生计。

“要想身强力壮，在家开个染坊。”张京华说，这个在当时农村流行的口头禅，其实反映出来的是染布匠们高强度的体力劳动。大量的布匹浆染，别说在夏天，就是在寒冬腊月，染布匠身上也经常会大汗淋漓。张京华从事浆染行当已经有50多年了，他的家族世代都是以染布为生，对于染布所有的工序他是再熟悉不过了。在张京华家不大的小院里，摆放着染布所需要的工具，

小炉、四方形火水铁罐和各种颜料。张京华回忆说，在他年轻时，染布的行业很是吃香，因为那时候大家穿的都是自家纺织出来的老土布，做成衣服或被褥就得浆染成各种颜色。那时候一个公社染布的就有十几个，生意好得无法形容。每个染坊都是雇人下乡接收需要染的布料，然后再将染好的布料送上门。每逢年关生意好的时候，实在忙不过来，他们会上门就地替主家染布。不用说，也是立等可取——把颜料注入火水罐搅匀，然后放进布料，大约浸一个小时，主家认为颜色满意，生意便完成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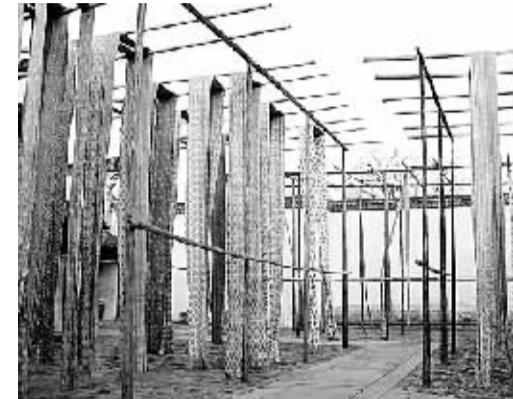
染布是个细心活

张京华说，在过去由于颜料单一，人们多穿蓝色衣服，土法染蓝布特别流行。染蓝布主要是抽靛脚子，用抽水葫芦抽出沉在染缸底的“靛脚子”。再下靛，将土靛放在簸箕里，在缸水中淘洗，使细靛漏下，再把碱和石灰加入水中。接下来是疏缸，下靛后用缸棍子搅动缸水，用缸碗看颜色深浅，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染布，在缸中间悬挂一个用铁丝编成的网状“缸罩子”，把缸水分成上、下

两层，把布浸在上层，用手操作，染半小时后取出，叠起来放在缸口上的“担缸板”上轻轻压出水分，摊开晾干，布就由黄变绿、由绿变蓝了。第一次染出的是浅蓝色，晾干后再染一次就深一层，愈染愈深，由浅而深的颜色依次是月白色、二蓝、深蓝、缸青，最深的蓝色近于黑色，称为“青”。

在整个染布行当中，用途最广泛就是老蓝子印花布了。一般所染的布料在制

作时，先将白布下水浸泡，用豆面、石膏搅成糊状，用硬油纸制版，刻上花、鸟图案，将版铺在白布上，用刮刀印制，然后投入染缸中染色，阴干后剥落图案上的附着物。由于刻版和刮灰浆的原因，点线既不能太大，又不能太小。太大的点或线段，灰浆容易在染色时剥落；太小的点，灰浆又不容易附着。印花布在改革开放前，在农村非常流行，深受人们的喜爱，被作为陪嫁被褥、衣服的必备品。



染布坊晒布（资料图片）

传家本领无人传承

张京华说，三百六十行，行行出状元。这话一点也不假，染色这行当，运用之妙，全在一个悟性，染料的分量、水的温度，种种因素最终决定了染出的颜色。

比如说蓝印花布就是采用传统的漏版刮浆的防染工艺，它是在蜡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蓝印花布所采用的镂空花版印染技术很古老，就是在木板或浸过油的硬纸板上雕刻、镂空制成花版。印染时，在镂空的地方涂刷染料或色浆，除去镂空版，花纹便显现出来。如果涂刷色料掌握不好，就会出现印色失调。在印制过程中要经过雕版、调浆、刮浆、下版、搅缸、入染、漂洗、晾晒、踩滚等9个重要的环节，每个环节都有玄机，稍有操作不好，染出来的布就成了民间所说的“花狗屁股”。在整个染布行当中，最能展示染布匠技艺的就是“回染布”，衣被褪色后要再染色就是回染，有原色的，也有要求染成其他颜色的。如果将蓝色的染成咖啡色的，那就需要染布匠的超强技术，把握不好，一件衣被或许就染得不伦不类。染好一件衣物讲究印染细腻，图案完美，这就体现在技巧的精湛上。张京华感叹说，如今自己虽然有精湛的传家本领，由于土法染布没有市场，儿女们也都不愿继承，他的这门手艺即将失传了。

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官话



■冯忠方

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虽然博学多才，却不善辞令，说话时常夹有“啊啊”的习惯语。他是广东人，说起“官话”来夹杂着许多广州口音，叫人听不懂。

“戊戌变法”初期，梁启超名噪京城，光绪帝久闻其名。1898年7月3日，光绪皇帝召见梁启超。依清朝旧制，举人被皇帝召见通常会被赐予翰林或内阁中书，赏四品衔。

以当时梁启超的声望，却只被赐了个小小的六品顶戴，原因是梁启超

的“官话”说得实在差，把“考”字说成“好”，把“高”字说成“古”，光绪皇帝虽侧耳倾听，还是听不懂梁启超的粤语“官话”。既然君臣对话似鸡同鸭讲，纵然君王满腔诚意，臣子满腹经纶，也只能相顾茫然。

官话说不好，吃了不少亏。这促使梁启超痛下决心学好官话。梁启超的原配夫人李惠仙自幼生长在京城，官话说得自然流利。梁启超便请夫人教他学习官话。夫妻二人，妇唱夫随，不消多时，梁启超的口语水准大有长进，在社交场合就逐渐得心应手了。

不一样的大学校长蔡元培

■阎泽川

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。有什么样的校长，就有什么样的学校；有什么样的校长，就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；有什么样的校长，就有什么样的学校气质。

1917年1月4日，隆冬的北京城大雪纷飞，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大的校门。这时，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，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致敬。

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这位“老爷”非但毫无傲慢之态，反而脱下自己的礼帽，气度谦和、恭恭敬敬地向校工鞠躬还礼。在场的人都惊呆了，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的事情。

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，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，从来就不把工友放在眼里，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？正式就任之后，蔡元培宣布对那些在学校内打杂、打扫卫生的杂役和勤务人员一律要以“工友”相称，并为他们创造夜校学习的机会。

一位外国学者曾赞颂他说：“世界上大学校长很多，但没有一个校长能对一个国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。”在蔡元培先生身上，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，一种不可言说的人格魅力。毛泽东在蔡元培先生逝世后，对他做过这样的评价：“学界泰斗，人世楷模。”

自谦为“乡巴佬”的钱钟书

■王文静

1980年11月28日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教授恳谈会上，钱钟书做了个演讲。这个演讲内容被记录下来，题目叫《诗可以怨》。当时，按说钱钟书对汉学的造诣，在座者没人能比得上他。

但他在演讲一开头就说，到日本来讲学呀，即使不必浑身是胆，也需要有斗大的胆。因为你们日本是汉学很发达的国家，你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，我面对你们这样的日本汉学同行，我心里是惴惴不安的。

他打比方说，他说面对日本汉学研究这个很大的宝箱，我像一个穷光棍，想来拿一点东西，但是没有号码锁，不懂开号码锁。只能看着这个大保险箱，眼睁睁地发愣。接着，他还幽默地讲了个意大利笑话《他发明了雨伞》：

有个穷乡僻壤的土包子，一天在路上走，忽然下起小雨来了，他凑巧拿了一根木棍子和一块方布，他还算急中生智，用木棍顶住方布，遮住头顶，回到家后居然没有被淋成落汤鸡。高兴得意之余，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一发明公诸于世。他听说城里有个“发明专利局”，就兴冲冲地拿棍连布，赶到城里，到发明专利局去报告和演示自己的发明创造。专利局的工作人员听他说明来意，哈哈大笑，拿出一把雨伞，让他看个仔细。

钱钟书以此自喻为孤陋寡闻的乡巴佬，到这儿来还要给日本同行讲学，讲点新鲜的东西，实际上讲不出来，那么只好拿着这块布，这根棍子在这儿来撑着，撑个局面，希望诸位不要笑话。钱钟书的笑话，令在座的教授们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被学界视为“文化昆仑”的学问大家钱钟书先生，充分显示了他的谦逊、诚恳和大度。今天读来，依旧会让那些自命清高、唯我独尊的“学者”们汗颜。